

“林译”百年评说与我国现当代翻译批评场域的自主化历程

陈水平

(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摘 要:意识形态并不是决定翻译批评观念与标准的唯一因素。百年来,学界对“林译”起起落落、纷繁复杂的评说就是很好的例证。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对“林译”的评说恰恰折射了我国现当代翻译批评场域的两次自主化历程。在这两次自主化历程中,批评者带着惯习和各种资本,在权力场中进行斗争,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批评场域及其独特的批评观念与模式。

关键词:林译;场域的自主化;翻译批评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2-0139-07

0 引言

翻译不可避免是“社会、文化、政治、种族和意识形态主导的事件”(House, 2015:2)。对某翻译作品的评论,难免受其所处时代的思想、习俗,乃至制度、规范的影响,并随着历史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从晚清的救亡启蒙、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为革命”、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十七年”、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帝反修”,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改革开放,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替与嬗变似乎始终引导和决定了翻译批评的观念与标准,也影响了林译评说的历程。但如果把这种翻译批评的变化单纯地归因于意识形态的更替,却显得过于简单。一方面,它不能解释翻译批评活动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后对林译的批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但改革开放后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颠倒;另一方面,它还轻而易举地否定了翻译批评在面对被操控时会产生对抗的可能性,比如在意识形态的强势控制下,钱锺书先生仍然敢于公正地评价林译。因此,本文借用社会学家布迪厄有关资本、惯习、场域等概念来探索林译评说百年流变更加复杂和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探索我国百年来翻译批评观念和模式的演变过程。

根据布迪厄的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Bourdieu,1984:101),每个社会场域都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场域中充满着力量和竞争,实践者带着惯习和各种资本,在权力场中争斗,从而形成了场域的实践。首先,参与者的实践会受到个人习惯的影响,也就是说,参与者在家庭成长、学校教育、工作实践等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步学习、强化并最终内化他们所认识的一系列规律,产生了定势系统,这一定势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实践的价值取向。其次,参与者拥有不同的资本,其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决定了其在场域中的地位。资本在场域中是一种排他性的资源,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资本的分配决定了参与者能否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惯习去进行实践。最后,必须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比如文学场域位于权力场域中,但却在权力场域中占据一个被统治的地位(Bourdieu, 1983)。但随着社会的分化,每个场域都会企图摆脱其他场域的限制和影响,最终达

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译论争鸣与发展的社会性溯源”(14YBA051)、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社会性视域下中国近代译论争鸣的深描研究”(14C0181)、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外语联合项目“基于文化转向的网络‘神翻译’现象研究”(16WLH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水平,女,南方医科大学副教授,翻译学博士,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及翻译教学研究。

到相对的自主化。

1 清末民初:场域的受控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1899—1916)是林译最受追捧的时期,时人纷纷在杂评、序言、题咏中抒发对其译笔的赞赏。据统计,该时期研究林纾的文献数量大约是50个,大多数评论对林译评价极高,褒扬其译笔简洁古雅,深得史家之流风余韵(肖志兵,2015)。比如,近代小说家徐念慈有论:“林琴南先生,近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者之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觉我,1908:9)禹钟(1926)有评:“(林)生平所译西洋小说,往往运化古文之笔以出之”,“光气烂然”,“有无微不达之妙!”当然,该时期也有少数的批评之声,主要因为林纾补译的《迦茵小传》上部暴露了迦茵未婚先孕及有私生子的事实。金松岑(1905)认为林的补译实在不妥:“今汝林译……内知尚有怀孕一节。西人临文不讳,然为中国社会计,正宜从包君节去为是。”寅半生(1907)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林纾:“今蟠溪子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删而不书。而林氏之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当然,这样的反面评价并不多。总而言之,该时期所有林译的评论并不比对原文,对其褒扬主要集中于译笔、语言、风格以及古文文法,而对其批评也只涉及译本内容。为什么会有这种单纯从文学角度而并非翻译角度来评论翻译作品的情况出现呢?

首先,林译读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财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觉我,1908:9)90%的林译读者是自幼饱读经书的士大夫阶层,惯习显然影响了他们对翻译的观点。一来这些旧学大多并不懂英文,因此无法比附原文,无从知道译作是否忠实于原文,自身存在的这些局限性决定着他们只能从原创文学的角度去评论林纾的译作。二来旧学们一直保持着汉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即使当时遭受鸦片战争的惨败,他们被迫承认西方在器物 and 制度层面上优于我国。那时候,仍然有着一股“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文化思潮,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文物、事迹等(章太炎,1906)。因此,用文言文进行翻译的林纾自然备受推崇。此外,当时文学领域也认为“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侠人,1997:92)。因此,按中国章回体小说来改译西方小说也未被认作不妥。甚至到20世纪初,士大夫等旧学们仍然没有任何文化劣势心理和自卑感。他们就是依照这种定势系统来评论翻译的:语言要用优美的古文;译文要读起来通顺,不可佶屈聱牙;要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要满足一定的美学期待;同样,出于对中国道德传统的维护,“删改”就是翻译的常态。比如,内阁学士孙家鼐和张百熙就在《有关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局奏疏》中提出:“译介西学各书时,有与中国风气不同及牵涉教宗之处,应增删润色,损益得中,方为尽善。”(张静庐,2003:10)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近代翻译批评活动依然附属于旧文学场域,占据林译读者群90%之强的士大夫阶层是旧文学场域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占据者,因此可以依照自身惯习在还未成形的翻译批评场域进行翻译批评实践,不但轻易决定了林译评论的主流,更为当下翻译批评决定了所有的规则。在目标文化中,翻译批评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场域,自然就会被当作本土原创作品,因此人们对《迦茵小传》译本的批评遵从的是中文语境下文学创作的标准。当时种种翻译评论和艺术广告中,“译笔”是当时判断译文优劣的关键条件,读者对译本最基本的要求是能读得通顺(叶嘉,2012:96)。因此,当士大夫阶层们通过自身的文化资本——杂评、序言、题咏等等——将“林译”的不忠实预设成了翻译的行为准则,并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最终将之规范化,这些不忠实的标准就成了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所有的社会参与者只有遵守这一规范才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因此诸多仿效林译不忠实翻译方法的译者们都因此得益,受到好评。五四运动前20年,许多译作,甚至新文化干将早期的译作都难免受到旧文学场域中文学批评规则的影响。比如,周氏兄弟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甚至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杂志《新青年》早期的译作都是用文言文翻译的。

对于林译读者群中那1%“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财力、欢迎新小说者”来说,尽管林译中错译、误译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三四流的著作,但那是一个国门初开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是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1914年第六期的《礼拜六》描述了那时的盛况:“故有人不爱买笑,不爱买醉,不爱顾曲,而末有不爱读小说者。”很多人受了林译的影响开始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其中一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例如,鲁迅在整个学生时代,都和林译小说相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通信中和周作人谈论;钱锺书也是在读了林译之后,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当然,也就是这1%的新学,在“西化”的热潮中慢慢壮大,企图让翻译批评摆脱旧文学场域的控制。最终,随着清政府的覆灭以及封建帝制的一去不复返,突然获得了社会资本的新学们便开始倒戈批判林纾那些不忠实的翻译。

2 新文化运动时期:场域的资本争夺和自主化萌芽

自1917年始,林纾就常遭到《新青年》同人或暗或明的批判,正面攻击就是那封著名的“双簧信”,其中用相当篇幅对林纾进行了肆意取笑和贬损。林纾在一年后创作《荆生》《妖梦》等小说作为反击,批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从而引发了新旧思潮之间的所谓“激战”。此后,林纾遭遇新文化派的舆论围剿,《每周评论》和《新青年》几乎成了批判林纾的专号,甚至有一期扩版刊登多达17篇声援新文化派、谴责林纾的文章。这些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他所译的书选本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作品,却未尝过问;第二是谬误太多,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闹得笑话百出”;而他最大的病根在于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把外国作品的书名译成有惊险、刺激意味的字眼,比如哈葛德的《钟乳骷髅》(*King Solomon's Mines*)、《橡湖仙影》(*Dawn*)、《三千年艳尸记》(*She*)等,明显带有中国旧式小说的痕迹,是取悦市民心理的旧文学观的延伸。尽管这个时期对林译的评论是从比附原文的角度出发,但以上批评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不忠”是20世纪10年代的翻译的常态。鲁迅根据井上勤的日译本翻译的《月界旅行》,其日译本共有28章,而鲁迅“截长补短,得十四回”,不仅将“(原文)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还“参用文言,以省篇页”(鲁迅,1981:152)。鲁迅的《地底旅行》改动更大,儒勒·凡尔纳的原作由45章构成,日译本为10回,而鲁迅译做12回。因此,该时期对林译全盘否定式的批判,个中原因也并非新旧对立那么简单。

首先,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大清帝国灭亡,士大夫旧学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资本,但还持有一定的文化资本,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新文化精英开始成长,其所译文本得到民国教育部的支持,被录入各级学校的国文课本,其提出的面向原文文本和文化的翻译理念随官方认可而成为译界规范(叶嘉,2012:102)。正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场域中的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其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因为改变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分量,也就相当于改变此场域的结构(布迪厄,1998:18)。各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曾经位于旧文学场域边缘的新文化精英们,一旦通过国家教育部的支持获得了社会资本,就需要争夺尚在旧学手中的文化和符号资本,最终让翻译批评场域从旧文学场域中被分离出来,获得自主。因此,一场对士大夫们的资本争夺在所难免,因为他们如果不去攻击那些旧学所推崇的经典译作,就无法推广他们自己新/重译的作品及其翻译理念。1910年前林纾已推出多部畅销译作,由其开创的不忠的翻译惯例在译界和读者之间都已相当稳固,因此新文化精英对林纾的有意攻击,事实上攻击的是旧文学场域所树立的翻译经典和规范,争夺的正是包括大众读者在内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

其次,新文化精英是我国1902—1910年间首次留学高潮以后崛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习惯显然异于士大夫阶层。随着新式学堂与西式教育的推广,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现代西方知识重塑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从而促成了他们完全不同的惯习——“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陈万雄,1997)。此外,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新文化精英们意识到我们落后的不只是船坚炮利,更是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上的。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

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的第五、六号上,提出了“文学为革命”的思想。因此,林纾那种取悦和娱乐读者的翻译,似乎无助于破除封建传统、实现思想革命,因而遭到新文化精英们的反对和批评。当然,在进入权力场域时,参与者们若只带着自身的惯习,是无法进行斗争的,场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活动的参加者还需利用各种形式的资本,进行斗争,以争夺更多的资本来最终改变场域的结构。在此,权力场域的演变导致了文学场域的资本争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经济资本的重新分配促使了翻译批评场域的最终分化以及新规则的最终确立。布迪厄将这种场域的分化过程称之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自主化实际上就是指某个场域摆脱其他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固有的本质的过程(Bourdieu, 1985: 15)。

当新文化干将摆脱了旧文学场域的控制,攫取了翻译批评的绝对话语权后,资本争夺结束,翻译批评场域被分化出来,成为“限定性生产场域”,翻译批评场域的自主化历程也就开始了。胜利者们开始从场域的内部规则来理性地反思林译的贡献。胡适(1923:215)早在林纾去世前一年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重新评价林纾,“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究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并指出那些既不能完全了解原书,古文能力又不及林纾的人“也要批评林译的书,那就未免太冤枉他了”。郑振铎(1924)在林纾逝世一个月之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对林译小说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随后,刘半农(1925)在《语丝》上发表《自巴黎致启明的信》,信中提及林纾,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郭沫若(1979:118)也指出,“前几年我们在占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许不免有一概抹杀的倾向”。然而,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后翻译批评场域再次被投入到“大规模生产场域”之中,并完全受制于政治权力场域,场域的自主化萌芽从此中断。

3 新中国成立后:场域的再次受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林纾一直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对立面而存在,不断以“清朝遗老”“封建复古主义者”“反动阶级的艺术家”等形象出现在各种文学史、教科书甚至红头文件中。1950—1979年有关林纾的文献数量只有58项,不但数量少,且对林纾的评价基本也是一棍子打倒(肖志兵,2015)。该时期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都保持了一贯的对林纾的激烈批判,林纾形象彻底走向反面。直到1979年,刘绶松(1979:31-32)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依然谈及“有的人以轻蔑不屑的态度来对付新文学,想让新文学在沉默的窒息中死亡下去”,指的就是林纾,并批评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与《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两篇文章是“复古主义者无可奈何的哀鸣”。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孔立于1962年编写的《林纾和林译小说》中就公正客观总结了林纾作为近代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钱锺书在1964年写的《林纾的翻译》也肯定了林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并重新评价了林译中的“讹”,认为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的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被淘汰。这些评论虽寥寥,但至少还是有人敢于与当时的主流批判背道而驰,也证明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批评场域的影响也并非控制与被控制这么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对林译再次否定的主要原因在于:1949年之后翻译批评场域受到政治权力场域的控制,翻译批评成为集体话语,体现的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1950年7月,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的沈志远对1949年以前的翻译提出严厉批评:“旧中国的翻译工作……完全是无组织、无政府的”(沈志远,1950:2)。1952年,响应国内的“三反运动”,《翻译通讯》开始连续刊发“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开展自我检讨和相互批评,提高译者的思想认识。就这样,经过思想和工作作风的整顿,翻译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计划性成为新译工作的明显标志之一(周发祥,2009:24)。这种强制执行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使翻译批评的主要任务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改造和统一思想的工具。“翻译为革命”的批评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翻译批评的原则和标准。尤其在“文革”期间,所有的外国文化都被认为是“毒害人们精神的危险渠道”,翻译批评成为一场群众性运动,译作序跋和评论的功能不在于讨论译作本身,而在于解读和阐释作品,批判原语社会现象,为原语文化定位,规范人们对原作的理解,消除和减少作品可能产生的“毒

害”(周发祥, 2009: 231)。因此, 尽管翻译批评场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出现自主化趋势, 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场域完全受制于权力场域, 体制决定文化产品, 翻译批评场域的自主化进程中断。

翻译批评完全受控于权力场域后, 许多知名的译者、学者都被场域边缘化, “那一时期的批评者主要是文化行政官员和部分主流政治认可的专家学者”(许钧等, 2009: 281)。这些主流政治认可的学者, 其习惯显然早已被“翻译为革命”的论断所改造, 成为这一规则的绝对拥护者; 也正因为他们的习惯符合了主流的政治观, 才能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资本, 从而成为翻译批评场域的中坚力量, 拥有绝对话语权; 也正是有了话语权, 才能使其获得相应的文化资本。就这样, 政治权力场的控制使翻译批评失去了自主性, 该时期对林译的评价也难免都是文学革命派的一家之言。但是, 布迪厄同时指出, 虽然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会以“机器”方式运作, 但这是现实中从未达到过的极限, 因为只有当人们反抗、革命、采取行动时, 才存在历史(布迪厄, 1998: 141)。因此, 这一时期肯定就会有像钱锺书、阿英、孔立那样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敢为林译做出不一样的评价。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当然, 钱先生敢这么做也是与其在权力场域中的地位及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分不开的。1950年8月开始他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 还曾参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等的会议文件的翻译工作(吴学昭, 2016: 252-255)。但总体而言, 该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几乎决定性地控制了翻译批评场域中所有参与者的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分配, 翻译批评活动因而成为强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

4 改革开放后: 场域的分化与逆分化

改革开放以后, 学界对林译的评价开始有了理智的回归。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率先重新出版了《林译小说丛书》, 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不仅肯定了林译小说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到过相当大的影响, 而且强调林纾首次将外国文学大量介绍进来, 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研究, 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纷纷为林纾立传, 到目前为止林纾传记和编年谱将近10本之多。有关林译的研究逐年增加, 单从知网的数据来看, 1980—1989年有关文献只有13项, 1990—1999年24项, 2000—2009年184项, 而2010—2017年突然猛增至366项; 2000年以来国内有关林译研究的专著已有两本。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从比对原文来分析林译小说的策略。新千年后, 随着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引入国内, 各种理论, 比如意识形态、改写理论、食人主义、阐释学、目的论、社会学等都被运用到林译小说的批评与解读当中。同时, 学界也开始反思“五四”时期对林译的极端批判, 比如张俊才(2005)提出重评林纾及“五四”新旧思潮之间的争斗,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化视角来观照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林译小说。谢逸群(2008)以《激进时代的不公: 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背后》为林纾鸣冤叫屈。因此, 新千年后, 对林译的批评又从八九十年代“感悟式”的点评或“挑错式”的指正逐渐转向为多元和开放的批评和研究。

林译批评的理性回归是伴随着翻译批评场域的分化而实现的。解放初期单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支配全社会各方面的唯一标准, 文学开始回归本身, 翻译批评场域逐步实现自主化, 开始遵循着它本身特有的逻辑运转。一个场域若是从社会场域和权力场域中获得了自主性, 这个场域的语言越具有科学性, 自主性强的场域遵循的是“是非”逻辑, 自主性弱的场域遵循的是“敌友”逻辑(李全生, 2002)。因此, 建国初期, 对林译的批评采取的是敌友立场; 改革开放后, 对林译的批评回归到对译作本身的对错评判。随着文化场域逐步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中解脱出来, 获得自主性的发展, 它们获得了符号权力, 获得了把现存的社会安排加以合法化的能力(Bourdieu et al., 1977: 12)。但场域的分化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分化之后还会产生逆分化, 逆分化是后现代社会的标志, 是场域在分化后一种反方向的运动, 是场域间的“分融”, 即场域发生内部分裂, 分裂过程中部分地融入其他场域中并发挥作用。可以说, 新千年以后出现的多元及开放的批评模式就是得益于翻译批评场域的逆分化, 因为翻译批评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 翻译批评不再囿于文本, 而是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政治与权力等外部空间。

当然,这种多元化倾向显然还受到参与者们不同的习惯的影响,但不同习惯的形成依然得益于场域的逆分化,也就是说,翻译场域自身的改变和发展使翻译批评者的惯习与前一代人有所改变。首先,学界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翻译行为本身,随着翻译(批评)场域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翻译被重新定义,翻译批评的理念、模式与方法也随着发生改变。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批评者仍然习惯以优劣对错来分析评判林译,但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对林译的评论开始出现大转型,翻译批评场域结构的发展变化显然影响了场域参与者的惯习。此外,改革开放后的学术相对自由,翻译批评者的惯习因而呈现较大的个体差异性,加之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配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出现极端化,而是出现比较平均的分布。正因为这样,各评论者才可以依照各自独特的惯习对林译做出不同角度的评论和研究,而呈现出多元态势。

5 结语

林译百年评说中的两次理性回归是我国现当代翻译批评场域企图摆脱其他场域控制,实现场域分化的两次努力。第一次始于清末民初,受控于旧文学场域,并随着新文化精英在资本争夺战中获全胜,翻译批评场域被分化出来,开始出现自主化萌芽;第二次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受控于政治权力场域,自主化萌芽中断,最终直到改革开放后,翻译批评场域才再次分化,并出现逆分化。然而,场域的自主化是场域特有的历史产物,自主是相对的,正如意识形态对翻译批评的控制并非绝对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对自主化转而成为社会政治统治的有利条件,使统治方式由直接变成间接,由外显变为隐蔽,翻译批评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翻译批评的任务不在于对与错的评判,而是站在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立场上,对翻译现象进行历史与文化的阐释,通过多元的批评视角与途径来维护并拓展翻译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5. 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 [J]. *Poetics* (14): 13-44.
- Bourdieu, Pierre. 198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J]. *Poetics* (12): 311-56.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M]. London: Sage.
- House, J. 2015.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布迪厄. 1998.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陈万雄. 1997.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郭沫若. 1979. 郭沫若选集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胡适. 1998.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M] // 欧阳哲生 (编). 胡适全集 3·胡适文存二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65.
- 金松岑. 1905. 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 [J]. 新小说 (17).
- 觉我. 1908. 余之小说观 [J]. 小说林 (10).
- 孔立. 1962. 林纾和林译小说 [M]. 北京: 中华书局.
- 李全生. 2002. 布迪厄场域理论简介 [J].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46-150.
- 刘半农. 1925. 自巴黎致启明的信 [J]. 语丝 (20).
- 刘绶松. 1979.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鲁迅. 1981. 月界旅行·辨言 [M] // 鲁迅全集: 第10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钱锺书. 1995. 林纾的翻译 [M] // 七缀集. 修订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沈志远. 1950. 发刊词 [J]. 翻译通报 (创刊号) (1).
- 吴学昭. 2016. 听杨绛谈往事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侠人. 1997. 小说从话 [G] // 陈平原, 夏晓红.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一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肖志兵. 2015. 百年来林纾研究概述 [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 113-119.
- 谢逸群. 2008. 乱世风云: 民国多少事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许钧, 穆雷. 2009. 中国翻译研究: 1949—2009[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叶嘉. 2012 上海通俗文学的翻译图景(1912—1920s)[D].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寅半生. 1907. 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J]. 游戏世界(11).

禹钟. 1926. 甲寅杂志说林之反响(1)[N]. 申报: 1-25.

张俊才. 2005. “悠悠百年, 自有能辨之者”: 重评林纾及五四新旧思潮之争[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06-112.

张静庐. 2003.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章太炎. 1977. 演说录[G]//张枬, 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卷二上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46-454.

郑振铎. 1924. 林琴南先生[J]. 中国青年(11).

周发祥, 等. 2009.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Centurial Criticism on Lin's Translation and the Autonomization Proces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Field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CHEN Shuiping

Abstract: Ideology is not the only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he concept and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criticism on Lin's transl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is a good example. A century's criticism on Lin'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reflects the two autonomization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field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in which critics, with their habitus and capitals, fight in the power field, and thus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field are formed with their unique ideas and patterns.

Key words: Lin's translation; field's autonomizati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pattern

责任编辑: 陈宁

“上海交通大学 2019 年叙事学暑期高端研讨会”通知

为广大叙事学研究者, 特别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提供学习叙事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平台, 共同探讨叙事学领域的前沿话题, 追踪学术热点, 开拓学术视野,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国际学术期刊 *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 (De Gruyter) 于 2019 年 7 月 3-5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 2019 年叙事学暑期高端研讨会。会议拟邀请 Brian Richardson(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谭君强(云南大学教授)、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与会交流。

一、研讨会主题:

1. 叙事学基础理论与发展流变;
2. 叙事学前沿理论与焦点话题;
3. 叙事学研究课题与基金申报。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亚飞 15108286535

电子邮箱: liyfine@126.com

2019 年 2 月 25 日